

从金融危机 看美式资本主义

王友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 金融危机、美式资本主义、美欧“模式”之争

〔提要〕 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奥巴马推出经济新政，对“美国模式”加以调整，加大政府干预经济力度，以力挽狂澜，摆脱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美欧“模式”孰优孰劣之争，但两家“模式”之争没有赢家。

〔中图分类号〕 F17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09)5 期 0046—06

〔完稿日期〕 2009年7月15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强烈的冲击：金融信用体系几临崩溃，实体经济陷入近70年来最严重衰退。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来说，更可怕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对自由放任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质疑，使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制度面临危机。美式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引起普遍关注。

一、美式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错综复杂，放任自由的美式资本主义体制无疑是主要原因。

美式资本主义承袭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即“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放松控制”，主张“最小的政府即是最好的政府”、“市场是万

能的”，即将“自由化”、“市场化”当作治理经济的“万应灵药”和“金科玉律”，将其绝对化、神圣化。对于经济、金融体制的运作和运转，统由“市场说了算”，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形同虚设，对金融机构以及包括房贷机构、保险公司在内的准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视而不见；纵容各种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投资银行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任意扩大市场份额。某些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一度高达60多倍（一般银行的杠杆率是10倍左右）。在巨额利润诱惑下，华尔街在金融业者眼中不过是一场“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场而已，“金融的基本戒律在贪婪侵蚀下已荡然无存”。在他们的“聪明才智”运作下，各种设计巧妙的衍生产品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合法”地滋生蔓延，这些“充满风险、信息不透明”的创新产品的名义价值与实体经济产

值形成巨大落差。一个个五光十色的泡沫点缀着美国虚假繁荣的金融资本市场。大量“有毒”金融产品不断恶性膨胀,尤其是针对信用等级差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及相关衍生品业务发展严重失控。“两房”和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率先扯断了建立在高风险投资基础上的“流动性链条”,流动性危机迅速转化为信用危机,最终酿发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与危机。欧洲金融机构参与了美国次贷及其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行与投资,结果深陷困境,与美国一同成为危机的重灾区。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实体经济,西方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世界其他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受到巨大冲击。现在危机向政治、社会领域扩散,如应对不当,可能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剧烈的金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正因为看到美式资本主义是这场危机的祸源乱始,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雷茨才有感而发地说,“由于此次危机,没人再对美式资本主义表现出丝毫兴趣,世人都因为美国的过错而遭罪。而此前不久,美国还自豪地向世界兜售经验:如果像我们一样繁荣,很简单,把一切交给市场吧!”^[1]

然而,美国保守主义者始终否认美式资本主义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危机虽然起端于美国,但不能归咎于以自由经济为支柱的美式资本主义,因为自由经济本身并没有错,它使市场充满活力,推动资金、技术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世界经济由此长期获益。私人金融机构的监管缺失对于危机爆发固然难辞其咎,但危机真正根源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结构长期失衡。这种失衡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发达经济体的过度信贷投资与新兴经济体的过度储蓄之间的失衡,这阻碍了世界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二是全球性贸易失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世界经济发展链条出现了断裂。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使其拥有庞大外汇储备,而其中的主要部分又以投资美元债券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中国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约达70%,占美国国债总额的23.6%。如此巨额的美元资产直接催生了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和美元流动性泛

滥,导致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疯狂发展,最终引发金融信贷体系的混乱和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将危机与中国政府“干预”人民币汇率挂钩。他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完全是比较优势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政府有意操纵汇率所致。“从某种重要程度来说,我觉得这是政策造成的,如果人民币汇率是可以浮动的,或者是减少官方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我觉得贸易赤字不会这么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马拉贝也说,“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保持于低位,致使亚洲其他出口国也纷纷压低汇价。汇率操纵大战使这些国家敛集了巨额贸易顺差,收益回流至国际金融体系中,令信贷泡沫持续膨胀,破灭后酿成今天的灾难。”^[2]

美国这些经济学家将危机归罪于世界经济失衡而为美式资本主义弊端开脱的观点是站不住的。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长期存在,不能成为美国推脱责任的借口。美国自身经济失衡正是危机的根源之一。长期以来,美国的“双赤字”(经常账户赤字与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经常账户赤字吸收了约75%的全球储蓄盈余。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大举外债维持高消费。尽管美国总体收入增幅较低,但美国的私人消费却在2007年攀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2%,家庭债务创纪录地达到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2008年达到150%左右。在廉价信贷泡沫的诱惑下,人们无意再按照传统方式进行储蓄,转而热衷于信贷证券投资。^[3]于是,超低储蓄、信用卡空洞、金融过度证券化共同撑起了一个巨大泡沫,而“一旦泡沫破灭,灾难就留给了世界。”^[4]

至于中国操纵汇率是危机根源的说法更无道理。中国从2005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的汇率制度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之上,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旨在保持合理与均衡的“管理”,人民币汇率将会“大起大落”,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场灾难。”^[5]这种“管理”不是操纵汇率,而是为市场合理调节汇率提供必要保障。这也是各国的

常态做法。基于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政府也多次明确承认中国政府没有人为地操纵汇率。

另有美国学者将危机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认为是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助长了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消费。这种说法同样让人无法信服。美国此轮高消费和低储蓄早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形成，而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则在2002年以后，从时间上就构不成因果关联。^[6]

美国保守派否认美式资本主义是危机根源而嫁祸于其他国家的观点，连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政、学界也不予认同。他们对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几乎形成共识，普遍认为美国倡导自由放任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导致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在美式自由市场体制下，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过度扩张信贷和消费。金融监管形同虚设，任由对冲基金及其衍生产品利用高杠杆率追求巨额利润，监管缺失引发“华尔街的贪婪、投机以及无序”，直接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总之，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尤其是无所顾忌的美元霸权体系直接导致了西方金融体系的混乱和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危机的起因作出什么五花八门的诠释，都不能改变美式资本主义是危机根源的客观事实和国际社会对此形成的普遍共识。

二、奥巴马经济“新政”与 美式资本主义

奥巴马上台后，为摆脱金融危机困境，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新政”，“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直接冲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支柱。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支柱是“反国家主义”，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新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出台了诸多政府大规模干预金融和经济活动的措施：推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拯救金融巨头，救援汽车行业，协助房贷市场。^[7]所有这些刺激方案和救助计划的实施都以政府主导和监督为条件。以美国百年汽车工业巨头“通用汽车”申请破

产保护为例，奥巴马政府出资5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在其重组后，美国联邦政府持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新政府积极介入金融市场，推行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对金融业监管，制订广泛金融业条例；确立信用评级的新准则，制定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法案。政府还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反对福利社会，打击工会”政策，力推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旨在将全体美国公民纳入医保体系，使其享有低医疗费用福利。与此同时，新政府着力促进工会发展，增加劳工权利，摒弃新自由主义的“富者愈富，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政府实施税收制度改革，中止上届政府对富人减税政策，实行“累进税”制度，以平衡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奥巴马上述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规模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以致政府的影子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呈现全面治理新自由主义的态势。西方许多学者和政客将其与当年大萧条过后的“罗斯福新政”的种种“社会主义”措施相提并论。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说，“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首先在美国回归”；有的说，“美国再次进入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时代”；有的甚至认为，“美国开始了向左转的时代”、“奥巴马当选标志自由放任市场时代的终结，同时宣告了美国大政府时代的开始”。这些说明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风光无限的美式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光芒不再。

奥巴马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大幅度调整受到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抵触和责难。他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美国的命根子，也是美国得以发展、强大，成为独步天下的超级大国的根本法宝，谁背弃之就是“离经叛道”，必然要失败。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危机不是美式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政府政策失当的产物；自由市场机制不会加剧危机，而是克服危机、加快经济复苏的关键手段；奥巴马政府的过分干预措施目光短浅，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与长远发展，其实质是打着刺激经济的幌子在兜售民主社会主义；美国社会不能容忍政府长久而大规模地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过度而长久的国家干预的结果必然是跌入‘社会主义’泥坑，

从而破坏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价值观，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个人自由都不能幸免”；无论奥巴马政府出台何种干预经济金融的措施，都只能是一种美国历史进程中的“插曲”，不会动摇美式资本主义的核心支柱——自由市场体制在美国的地位。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出现企稳迹象，美国国会中的保守主义势力急不可待地要求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尽快取消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扩张和干预措施。为了反对奥巴马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他们搬出了传统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信条，即认为政府在本质上就是市场自发秩序的“敌人”，对于经济和金融活动，政府始终具有“恶”的特性。他们的理由是：市场经济信息是分散的，它掌握在千万市场主体的手中，任何权威或权威机构都无法集中所有的市场信息去有效地配置资源，“在情况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央政府去处理一个涉及如此规模的资本价值信息，并使竞争性的资本达到应有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事情。”^[8]“国家干预经济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前提是经济预测准确到位，提供相当可靠的经济未来发展信息，而国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永远无法做到。”^[9]在极力贬低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保守主义高调颂扬市场这只“万能之手”，认为市场具有神奇功效，在市场自发调节下，不管是生产过量还是需求不足，一只看不见的手总能使之自动实现平衡。“这只无需人为控制的‘无形之手’能自动地促进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增长。”^[10]

保守主义上述观点在美国国内颇有市场，因为美国确实具有钟情自由市场的历史传统和情结。多年来，美国资产阶级始终秉承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戒律，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圭臬”，使之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导理论和政策杠杆。他们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将国家的经济职能限制在为市场经济建构法律秩序环境和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范围内，并把政府的职能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国家免受外来侵犯；二是保护公民免受不公正的压迫；三是建立和维护公共机构。^[11]也就是要政府专职为资产阶级及其安身立命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政治保护和经济秩序保

障。因此，美式资本主义被保守主义者自诩为“最纯正的资本主义”、“原汁原味的资本主义”而在美国长期风行。

从美国建国以来历届总统的经济政策来看，自由放任主义始终占据主流，国家干预只是出于对大萧条或危机的恐惧而在所谓的“特殊资本主义时期”采取的权宜之策。期间虽然有多位民主党总统上台推行“中左”政策，但并未扭转自由放任主义的主流方向。只有当自由放任走过头，发生类似“大萧条”、“金融危机”的灾难，资产阶级才会不得已给如脱缰之马的市场套上“笼头”。一旦危机稍许缓解，资产阶级就会及时卸下笼头，继续任其自由驰骋。由于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根深蒂固，美国任何当政者都不会轻易动摇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使然。尽管上世纪大萧条后，美国进入较长的罗斯福新政时期，自由市场主义暂时退出美国以至西方经济主舞台，但是，五十年后的“里根革命”将国家干预主义一扫而光，自由放任主义重返美国政治经济舞台中心，后来的小布什政府将其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涵的“华盛顿共识”。资产阶级之所以不愿放弃自由放任主义，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是最根本的原因。政府干预不仅会限制金融资本利益肆意追求利润，而且会导致福利资本主义或集权主义，这势必会导致投资与利润的下降，从而损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干预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目的是防止过于放任自由的市场引起整个经济体系崩盘而使资本利润颗粒无收。

奥巴马的经济“新政”，加大对美国金融机构和经济活动的监管和干预力度，对美国极端自由的资本主义模式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美国保守派以美式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卫道士的身份攻击其搞“民主社会主义”、“破坏美式资本主义”，却是危言耸听。就奥巴马新政的实质而言，所谓的“奥巴马主义”其实仍然是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体系，其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范畴。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奥巴马不再教条式地奉行“市场全能主义”，也不认为政府

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是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辅助才能避免危机的发生。因此，“奥巴马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也被称为“温和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不再如激进的新自由主义那样一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是在坚持自由市场体制的同时，通过政府干预帮助市场具备自我修复行动能力。从“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经验来看，在此次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以及美国经济脱困并有所复苏之前，奥巴马政府的干预行为难以停息。但保守派的严厉责难会对奥巴马的干预政策形成阻力和干扰，使其不能完全放开手脚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一旦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政府将减少干预甚至退出国家经济领域的活动。

美国两百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表明，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自由市场主义发展史。国家干预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危难关头的自我拯救。当危机结束以后，政府干预会减弱以致停止，而让自由市场主义重新回归。这如同钟摆一样，当自由放任的指针摆至极点时，经短暂停顿后必然继续回摆。

三、资本主义的模式之争

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领域是高度一致的，都搞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民选政府那一套；至于经济体制，其基本属性也是一致的，都搞私人企业、垄断资产阶级主导、大鱼吃小鱼式的非良性竞争以及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获取利润等。各国的不同仅在于经济社会运转模式的不同，主要有两种模式，即美国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欧洲代表的政府干预型自由市场模式。

危机爆发后，美式资本主义与欧式资本主义即展开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欧洲领导人借机向美式资本主义发起攻势。法国总统萨科奇高调批评，美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投机基础上的金融资本主义，它腐蚀资本主义本质，歪曲资本主义要义，是不道

德的体制。他还提出，应建立一个尊重生产、富有创业精神的全新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要弘扬欧式资本主义。为此，欧洲领导人在巴黎召开主题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会议，竭力宣扬欧式资本主义，即政府主导的社会市场经济，宣称欧洲模式有助于市场良性运作，是“道德而规范”的资本主义。他们还断言在21世纪中，欧洲模式必将代替美式资本主义引领世界。德国总统克勒则宣称，就目前态势而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克服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最佳选择。”

面对欧洲的攻击，美国保守主义者毫不示弱。他们辩称，金融危机爆发并不是美式资本主义的失败，美国政府出台大规模救助计划，并不表明美国向欧式资本主义靠拢；美国需要的不是欧式“更多的政府”，而是“更聪明的政府”。对于美式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他们声称，尽管美式资本主义存在弊端与不足，却是效率和利润的“发动机”，是其他模式无法比拟的。他们坚信，美国模式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很快地从危机中走出来，重新成为引领世界的典范模式。

两个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美式资本主义固然存在诸多弊病，是这次百年难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但这并不反衬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高明和胜利，更不表明欧洲模式将替代美国模式而在新世纪引领资本主义胜利前进。这是因为，欧洲模式本身并不完美，而是同样存在严重弊端，其中主要有两点：

其一，未能解决好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一直受“市场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困扰。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它没有根本解决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之间的矛盾，无法破解“大政府”必然招致“小市场”与“低利润”的宿命。应该看到，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自发的“无形之手”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彼此以否定对方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多一份人为的“竞争秩序”就意味着少一份市场的“自发秩序”，“大政府”意味着“小市场”。在存在过多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效率的发挥必然受到束缚，资本利润率必然不高。因此，政府到底

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活动才不会影响市场效率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正如兰德公司的研究表明,“政府和市场的选择是在两种不完善之间的权衡”,是“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小政府、大市场”成了主政者必须直面的两种后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必择其一。尤其是当国家干预取得暂时的成效时,人们容易过多相信二者的相容性,以为国家干预的人为秩序与市场的自发秩序能够在一种体制下共存,因而忽视了二者的根本对立性。这势必会进一步加重对国家干预手段的依赖,最终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其二,未能解决社会公正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欧洲国家奉行的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秩序政策一方面起到了拉平收入差距、调节阶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淡化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意识。以德国和瑞典为例。由于优厚的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德国人与瑞典人对社会福利依赖性非常严重,自愿不就业、常年病假、提前退休,以逃避社会责任与义务的“福利”病严重地侵害了两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肌体。这使两国陷入福利国家的困境:经济增长低迷,就业形势严峻;公共开支和福利开支不断增加,财政赤字高居不下;老年人口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多,养老、失业、医疗保障体制不堪重负,社会保障体制难以为继。两国的福利困境表明,欧洲模式所期望的“国家为自由市场构建秩序政策框架后,最大程度的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就会同时产生”的结果终成泡影。有的学者得出的“自由竞争确保的效率与自由竞争必然产生的社会差别如同孪生同胞一样相伴相随”的结论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

由此可见,欧洲模式不可能代替美国模式而解决资本主义的难题。它只是在传统自由主义失败后,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注入国家控制与社会公平内涵后的一种具有折中性和平衡性的权宜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惟利润是从的资本主义难以走出马克思早已预言的“危机——繁荣——危机”的宿命,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弊端和缺陷。无论是美式资本主义还是欧式资本主义都不是新世纪引领世界的“普世文明”模式,更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历史终结”模式。只有结合各国自身国情并借鉴他国发展经验的发展模式才能引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成功。

注 释:

[1] The End of American Capitalism?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2008.

[2] 潘英丽:《本末倒置的“中国责任论”》,《南方周末》,2009年6月4日。

[3] 斯蒂芬·罗奇:“美国经济失衡与中国无关”, www.financelj.com/cn/news.

[4] “金融危机源于中国是荒谬的”, www.sina.com.cn/c/2009-02-20/225517140374.shtml.

[5] 同注释[5]。

[6] 周小川:《关于储蓄率的若干现象与分析》,《金融时报》,2009年2月11日。

[7]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向”, www.cnii.com.cn/20080623/ca547823.htm.

[8] Bruce Caldwell,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1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62.

[9] Hans 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p. 184.

[10] Michel Beand,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p. 75.

[11] Ibid, p. 76.

(上接第 65 页) East Asia: Securitization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 and Human Secu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2, p. 120.

[36] 《为改善国家形象, 印尼不再发布禽流感死讯》, <http://www.zaobao.com/special/birdflu/pages3/birdflu080606.shtml>.

[37] John Ruggie, “Reconstituting the Global Public Domain - Issues, Actors, and Pract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pp. 512-516.

[38] GBC, GBC Member List, <http://www.gbciimpact.org/live/home/home.php>.